



日本侵华内幕

日本史书中的‘九·一八’事变

中日战争已结束了整整 50 年。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的历史回避抵赖，死不认帐，甚至颠倒黑白，美化侵略。但也有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史学家秉笔直书，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事实毫不客气地揭露和批判。在他们的笔下，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和阴险用心暴露无遗。

下面就是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

1931 年 9 月 18 日午后 10 点多钟，关东军在沈阳郊外柳条沟附近亲自动手炸毁满铁轨道，而把它说成是中国兵干的，立即对附近的中国兵营北大营发动进攻，同时在“南满洲”一带开始了军事行动。这就成了历时 15 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开端。

炸毁柳条沟铁路，是为发起军事行动制造借口而事先策划的谋略的一部分。早在 1927 年的东方会议上，就由关东军提出了以武力占领“满蒙”的计划，1928 年的炸死张作霖事件原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想乘此机会发起武力行动的阴谋。这个计划遭到挫折之后，1928 年 10 月，石原莞尔中佐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

谋，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佐一当上关东军高级参谋，就以他们两人为中心开始拟定更加具体的占领“满蒙”的计划。1929年7月，为了研究关东军的对苏作战问题组织了参谋旅行，途中石原提出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和《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关东军根据这个方针，继续研究占领和统治“满蒙”的问题，1930年5月，归纳为《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这样，由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趋势日益增强，1931年5月，石原在以《“满蒙”问题私见》为题的手记中主张为了占领“满蒙”，要用武力行动迫使国家跟着走，而这种机会要用策略来创造。柳条沟事件就是根据这种策略创造的机会。

在关东军参谋的计划方面，原大尉甘粕正彦（关东大地震时杀害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妻的凶手）等大陆浪人也参与策划，分担了在各地搞袭击日本人等阴谋来制造出兵借口的角色。同时，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中中佐等也是他们一伙，为了补充关东军的兵力，作好了出动驻朝鲜日军的准备。还有，在军的中央部中，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该部的中国科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板垣和花谷于8月中旬赴东京与重藤、桥本等进行磋商，并接受了搞阴谋的资金。到了9月，关东军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风声传开了，在9月15日内阁会议上，外相币原喜重郎质问了陆相南次郎。于是，军中央派遣建川到当地去调查实际情况，可是建川等经商议后给当地拍电报说：计划已经暴露，要提前开始行动。原来预定在9月28日左右开始的行动便提前十天在建川到达当夜开始。

柳条沟铁路刚一炸毁，逗留在沈阳的高级参谋板垣就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沈阳附近的部队进攻沈阳城及北大营。驻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根据石原参谋的献策，本庄繁司令官于19日下午1点半，命令关东军所属部队向沈阳方向集中兵力，占领营

口、安东、凤凰城，并准备进攻长春，请求驻朝鲜日军增援。这些都是板垣和石原预先准备好了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和参谋长三宅光治都不知道这一阴谋，一听到事件的报告，便按照石原的意见作出了决断。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从旅顺向沈阳迁移。

司令部设在辽阳的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立即奔赴沈阳，到 19 日中午占领了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兵营。营口、安东、凤凰城则由独立守备队占领了。在长春，中国军队猛烈抵抗，战斗持续了 19 日一整天，日军死伤 145 名。这样，在 9 月 19 日这一天，“南满洲”铁道沿线的主要城市全被日军占领了。

接到关东军请求增援的驻朝鲜日军，立即命令飞行 2 中队和混成 1 旅团准备增援，在 19 日上午，开始用铁路运输增援部队。

19 日凌晨 1 点多钟，事件的第一次报告到达东京。从当天早 7 点起，陆军中央部商讨对策，根据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这次关东军的行动，全都是恰当的”的意见，着手准备向关东军增加兵力。当天从上午 10 点起，召开了内阁会议，当陆相南次郎刚一说明这次事件，外相币原就报告了外务省得到的情报，其内容暗示这次事件完全是由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因此，南陆相没能提出增加兵力的方案，内阁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而这次会议既没有为不扩大方针规定什么具体的措施，也没有追查陆军的阴谋。当首相若槻礼次郎就“中国其他地区日侨的危险”，向海相安保清种询问海军的准备情况时，海相回答说，在佐世保准备了 1500 人陆战队，好像事件的扩大已在预期之中。

驻朝鲜日军出兵“满洲”，事属向国外出兵，为此必须有内阁会议的承认和天皇的命令。于是，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拍电说：“增援关东军一事，在奉敕命令下达之前，希暂停止”，并把这一宗旨通知了旅团长和新义州国境的守备队长。

按关东军的计划，必需出动驻朝鲜日军。于是，策划使第 2 师团出动到满铁沿线以外的吉林，造成“南满洲”兵力不足的局势，以便把驻朝鲜日军强拖进来。为此，按照吉林特务机关和甘粕正彦等浪人的策略，向日本人房屋扔炸弹，由自己造成不稳的形势。然后，9 月 21 日下令出兵吉林。驻朝鲜日军看到这种情况，决定擅自越境。事件波及到满铁沿线以外，日军占领了整个“南满洲”。

在 9 月 21 日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主张必须从朝鲜向“满洲”增兵，可是除了首相若槻以外，没有人对此表示同意，参谋本部十分焦虑。正在这时，突然收到了驻朝鲜日军的增援旅团已越过国境的电报。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擅自出兵，显然是干犯天皇的大权，于是参谋本部出现了“有必要研究大臣和总长的辞职问题，并在悲壮的决心下进行了各种准备”的紧急事态。而陆军中央部不仅不责备驻朝鲜日军违反以前的命令，反而要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以收拾事态，并以陆相和参谋总长的辞职来威胁政府。然而，在 22 日内阁会议上，竟出乎陆军意料，全体阁员没有表示不赞成的。于是决定既然已经出动了，就承认这个事实，既然承认了，就支給经费。首相立即把这件事上奏天皇，接着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奏请驻朝鲜日军出动的命令和与此有关的事项，取得了天皇的批准。

这样，在出兵之后颁发出兵命令，用来蒙混过去，把干犯天皇大权的问题竟不了了之。

（林治波 辑）

卢沟桥事变前夕的一场“鸿门宴”

1936 年，随着日本频繁的挑衅活动，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为了缓和危局，改善气氛，6 月 6 日上午 11 点，冀察政委会委员长

兼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附近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日本军官在宴会上甚为嚣张跋扈，引起 29 军军官极大愤慨，演出了一场“鸿门宴”。

日本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等 30 多人。中国方面出席的有 29 军军长宋哲元，北平市长秦德纯，37 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冯治安，38 师副师长李文田，37 师 110 旅旅长何基沣，38 师 114 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 26 旅旅长李致远，114 旅 227 团团长杨干三等。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人。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河边、松室、松岛、樱井、吴佩孚等共坐两席，是主主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在两张坐席旁各设一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使用。

宴会开始，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接着双方穿插排列队形一起照了相。入席就坐后，酒宴开始，中国军官默默饮酒吃饭，很觉压抑；日本军官却趾高气扬，吆五喝六，大声喧嚣，俨若宴会主人。酒至半酣，松岛突然起身离坐，说要为大家表演助兴，他先舞蹈，后舞刀，抬手投足都冲着中国军官挥来舞去，充满了杀气；29 军军官也停止了饮酒吃饭，静观事情变化。松岛还没落坐，一个日本军官就跳到一张空桌上大声唱日本歌，他唱着，两眼乜斜地向 29 军军官进行挑战。紧接着，又有两个日本人离席，一个窜上空桌高歌，一个在地下围席狂舞。目睹这种情况，中国军人个个握紧拳头，怒火中烧，他们真想站出来和这些日本人拼一场。这时，只见秦德纯走到董升堂身边，他附耳对董升堂说：“事情紧急了你是打拳呢，还是要刀？”董升堂急切地说：“我先打一套拳，再耍刀！”这时，何基沣已忍耐不住了，他跃到空桌上，

放喉高唱《黄种歌》，他希望用歌声唤起这些耀武扬威的日本青年军官的良知：“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先着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笔，后哲先贤。”随着这激昂的歌声，中国军人拍掌击节，心中为何基泮的机智暗暗叫好，同时也盘算着出个什么节目压压日本人的气焰。何基泮歌声一落，董升堂立即站起来，拱手向四座作揖，接着打起了在西北军中流行的八卦拳来，他手推臂挡，刚柔相济，表现出很深的武术功底。中国军人的闷气稍抒，都跃跃欲试。接着李致远练了一套武术，动作迅猛，干净利索。日方似乎觉得他们的势头被压下去了，就再出来唱歌，李文田唱起京戏中的黑头腔作答；日本人又出来跳舞，李致远就再打一套漂亮的花拳回敬。宴会厅变成了演武场，中日军人就这样你一个“节目”，我一个“节目”的比下去。日本人开始舞刀了。董升堂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把西北军使用的大片刀，走到席前劈了一趟刀法。只见刀刃寒光闪闪，一刀刀有力地砍下，带着嗖嗖的风声。日本军官们坐在席间，紧盯着董升堂手中的大刀一动也不动，他们是否想起了喜峰口战场上 29 军惊心动魄的大刀队呢？在日本人刚刚开始舞“倭刀”的时候，李致远就命令他的传令兵坐小汽车到自己家里去取刀。当董升堂刚演完刀法，李致远的传令兵也带着刀赶回来了。这是一把用上好钢材精心制造的柳叶刀，是他特意定做的。李致远接过心爱的刀，用手抚摸了一下刀身，就急忙换上传令兵的布鞋，他要练一手“滚堂刀”。这套刀法是他小时候学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练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只见他握刀站定，目光从眼前的日本人身上扫过，然后正视前方，猛然起势。他进刀刺杀，左砍右劈，上挑下搪，招招式式，灵活自如。一会儿似龙腾虎跃，身体完全隐在一片寒光之中；一会儿推挡退进，有拔山盖世之力。舞

毕，李致远很英武地回身入座。日本人相互交头接耳，骄横之气稍有收敛。他们自知舞刀打拳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就另用计策，想用酒灌醉中国军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于是纷纷离座，拥到李致远面前，一面称赞他的刀法，叫他“李武术家”，一面用小饭碗向他“敬酒”。李致远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到厕所将酒吐掉，再来和日本人对饮，始终没有显露出醉意。面对李致远的“如海酒量”，日本人只得另出新招。松岛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围在头上，在额间打一个结系牢，然后脱去上衣，把一壶酒放在头顶上。他同时点燃八支纸烟，三支叼在口中，两支塞进耳朵里，两支插入鼻孔，一支按在肚脐上。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八支烟卷一会儿同时冒烟，一会儿又同时不冒了。中国军官看他简直出尽了洋相，就不再理睬他们。日本人觉得没趣，又提出进行高雅的比赛——写毛笔字。他们叫勤务兵磨墨铺纸，尽心尽意地写起字来。应该说这些日本人中确实有些毛笔字写得很不错的，他们自鸣得意，欣赏着自己写的字。“秀才大帅”吴佩孚起身上前，他泼墨挥毫，那苍劲有力、龙飞凤舞的醉笔不停顿地直落下来，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一幅气势磅礴的大条幅写成了，日本人当然不是对手。

这时，几个日本人一齐走到宋哲元跟前，他们高喊着号子将宋哲元抬了起来，另外几个日本人也把秦德纯举起来了。29军军官们见此情况，就把河边拉起来举起，他们相互交换眼色，同时甩手将河边高高抛起，接住，再抛起。顿时，怀仁堂里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双方个个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哲元怕出问题，马上发表即席讲话，说中日应该亲善等等，河边也讲了几句，说了这次联欢会开得很好之类，……。宴会结束了，宋哲元和河边到后边的一个房间去休息，日本军官先后退席。29军的军官们心怀愤懑，昂然走出了怀仁堂。

（林治波 撰）

不可思议的预告——“七夕之夜” 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策划“七·七”事变的内幕，至今仍讳莫如深，但当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的今井武夫，却在回忆录中泄露了一个秘密：早在 1937 年 6 月，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就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即“九·一八”事变。后来局势的发展表明，日本人的预言丝毫不差地应验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果然在“七夕的晚上”爆发。这一情况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卢沟桥事变同“九·一八”事变一样，是日本侵略者预谋策划的。

且看今井武夫的回忆：

1936 年“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政局不太稳定，广田弘毅、林銑十郎这两届内阁都以短命告终。1937 年 6 月 4 日，那位被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麿，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终于适应了国内各界的愿望，风头十足地登上了舞台。

6 月 26 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近卫内阁拓务大臣大谷尊由的哥哥大谷光瑞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

大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满洲、台湾、中国、马来亚、爪哇等地进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对日本的对外发展政策，具有透彻的见解。

可能是由于我过去和他见过面的关系吧，他第二天，即 27 日上午就邀我去，并撇开了其他的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畅谈。

当时大谷所谈的是下列这些内容：

“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我总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来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现在幸好成立了近卫内阁。近卫家,自从上一代的霞山公以来,比任何人都更关心大陆,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那是有深远的来由的:自从文磨当家以后,在他身边又增加了新的大陆问题研究家,他的手下也就有了一个网罗了所谓新旧中国通的智囊团。因此,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变日华关系的话,除了现内阁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次,我的弟弟尊由入阁担任拓务大臣,我认为这才是实现我的愿望的好机会。我这次来到此地旅行,也无非是想对国策有所贡献而已!”

他在说了这一篇开场白之后,就对华北最近的形势征求我的意见。

对此,我先分析了今春以来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然后说:

“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那末,对现行的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在华北过急地提出经济权益的要求,实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

大谷除了重复他的“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这种说法以外,又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北平武官无论如何要回日本去一次,把刚才提到的那种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因此,我已经派跟随我来的桥本文治从这里直接回国,对促成你回国的事作好准备工作。”

大谷就这样立刻离开北平,经由通州和青岛回国。

跟大谷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陆军省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

福中佐也来到北平，他的这一次旅行，似乎是经担心华北会发生事变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陆军省〕军事课长石原莞尔的授意，为了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到这里来观察一下血气方刚的日本青年军官的内部情况，并视察一下华北的一般情况的。

我对他讲了我和大谷讲过的同样的意见，并把处于危险状态中的华北情况向他详细地谈了一遍。

冈本在北平、天津等地旅行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就回到了东京，并立刻向上级作了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极为乐观的报告：

“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原来他的调查和观察，主要只是在于当地的日本军中有没有和满洲事变中像柳条沟那样的阴谋。看来他是听信了天津军参谋以及冀察、冀东两政权的军事顾问们的说明，认为日本军内部并没有什么别有用心阴谋，结果对日华两国的关系已经接近导火点，对当前那种非常危险的摩擦等现实状态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那是因为说明的人所说的和听的人想听的，没有对准口径的缘故。可是，他提出报告之后隔不多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件。接着他又被任命为天津军参谋而重新来到了现场。他在见到我时立刻就率直地说：

“我在上次和你见面时听到你讲了有关现场的危险情况，回国后却作了主观的乐观的报告，可是当前的现实却爆发了卢沟桥事件，这完全是由于我的不明智，真是对你不起。”

这一年的 11 月我调回东京任职，又会见了大谷光瑞，他对我说：

“我把在北平听到你讲的现场情况报告了杉山陆军大臣，也就是在这同一天，在当地爆发了这一次的事件，所以没有来得及把你召回东京。”

关于冈本对华北形势的观察是否正确，我无意加以批判，只是对于当时东京突然把大谷、冈本两人相继派到华北来进行现场考察，其真意究竟何在，却觉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

后来听说，那时候，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视察人员。

7月6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我应邀在陈子庚家里吃晚饭，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楼的西边。陈子庚过去当过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

不料在开宴时，一个不速之客——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却穿着一身中国长衫翩然出现了。我和石友三早在五年以前，当他还在韩复榘手下时就有过交往，冀察政权建立后也和他有着私人间的亲密交情。因此，他好像知道我今天在陈家里，特地前来看我的。石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质问：

“武官曰华两军今天下午3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

霎时间我大吃一惊，坚决地否定说：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

“我泰然自若地呆在这里，就是没有发生这样重大事件的证明，所以定定心心地喝酒吧。”

对此，石友三仍坚持己见，而且不知为什么隐瞒着这一情报的来源，总是固执地说事实没有错，甚至还说：

“即使日华两军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下，对于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也吃不准他的这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但他的态度却始终是慌慌张张定不下心来的样子。不久开宴，上了最初的几道菜和燕窝后，大家照例干杯一番，他就匆匆忙忙地离席而去了。

陈子庚和我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不过对他那些唐突的话以及中途退席，倒也没有在意。接着便转入本题进行了讨论，到晚上 9 时许结束宴会。

后来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我对自己未能觉察仅隔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不禁慨叹自己目光之短浅。石友三的话，就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从时间上来说是提早了一天，但好像预见到卢沟桥事件似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是单纯的巧合吗？这真使我感觉到好像落在云里雾中了。

（林治波 辑）

“七·七”夜幕下的枪声

1937 年 7 月 6 日，大雨滂沱。

日军驻丰台部队不顾道路泥泞，又一次在铁路桥东北龙王庙前的演习场地上，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同一天，日军还到宛平城东门外，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到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很恼火，赖在城外不肯退去，并进行紧张的军事部署。中日双方相持了十几个小时，空气异常紧张。天色渐晚，日军无计可施，只好退回丰台。

7 月 7 日上午，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下午，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声称要举行夜

间演习，演习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龙王庙内有中国士兵驻守。日军在此进行夜间演习，显然是有企图挑衅行为。

日军第8中队在城外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这些迹象引起驻军和宛平城内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注意，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以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7时30分，暮色降临，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日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待天完全黑下来以后，近600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这时，天上没有月光，夜色中宛平城若隐若现。城内城外，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漆黑的夜里，日军将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了。10时40分，中国军队第29军驻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在寂静的夜幕下，枪声是那么刺耳，引起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

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宛平守军认为，此时已值深夜，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会，妨碍治安。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守城官兵拒绝说：我方部队正在睡眠，枪声响自城外，非我军所发，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与我方无关。我们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打开城门！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县城，开枪示威。同时，清水节郎派岩谷曹长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并要求派兵支援。

这仅仅是日军大量挑衅活动中的一次小挑衅吗？是谁在宛平城外放枪数十发？丢失日军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清水节郎曾在其笔记中作了如下记述：晚

上午10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清水的上述说法是否可信呢？

本来，日本关东军早在6年之前已侵占了中国东北；华北驻屯军的成立也是日本侵华的罪恶产物。日军实施演习的龙王庙地区，即便在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中，也是禁止日军随意演习的。因此，究竟谁是侵略者，已无须由7月7日“第一枪”来作判断。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战后，日本都不断有人借此大作文章，企图推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责。在他们的笔下，“七·七”事变的肇事者居然变成了中国第29军或冯玉祥。到了1938年，更有人居心叵测地提出了“中共说”。为了驳斥这些别有用心之徒的无稽之谈，这里有必要对“第一枪”稍加述说，以正视听。

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枪”的细节上，一直缺乏直接有力的史料证据。那些别有用心之徒，之所以提出了种种荒谬说法，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但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仍可通过一系列旁证对事实真相加以推断。

首先，从当时的现地形势看，如上所述，北平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西南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成为北平的唯一门户。在日军看

来,如果占据了宛平,便可切断平汉线,使北平成为一座死城,因此,宛平势在必夺。这就是连日来日军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和蓄谋制造挑衅借口的背景和用意所在。

其次,事变爆发前的几个事件也值得玩味。其一是:1937年5月,中共北方党组织曾获得一份日本特务机关印发的高度机密文件。这个文件透露,日军可能于6月份左右在平、津、唐、保地区发动一次重大的军事侵略行动。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殷汝耕政权正在通州加紧训练特务。中共地下组织将此通知给29军,建议防范。果然,6月29日,29军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据被捕特务供认,他们于6月23日潜入北平,准备冒充学生中的“共产分子”,在29日夜12时放火开枪,而以演习为名埋伏在城外和东交民巷的日军,则以枪声为号,马上在“防共”“安民”的名义下占领北平。只是由于29军有所防范,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其二,前面曾提及,在事变爆发前的6月,东京私下纷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另外,据今井武夫记述,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7月6日傍晚,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突然与他见面,透露说:“今日下午3时在右,日华两军在卢沟桥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之中。”但是他隐瞒了情报来源。这件事也使人大惑不解。不过,可以肯定这绝非出于巧合。汉奸石友三与日方人士过从紧密,因此而窥知日方的阴谋计划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实际的军事行动由于某种原因没能按时进行,但石友三所透露的时间与事变实际爆发时间已非常接近。

另外,事变发生后现场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帮助人们作出判断。据日方当事人回忆,枪声来自永安河东岸龙王庙附近堤坊,即宛平城西北方向,但同中国方面交涉时,却又说是宛平城内传出枪声,因而要求进入城内搜寻失踪士兵。据中国方面当事人回忆,

枪声不是来自宛平西北，而是宛平东北方，那里正是日军演习的地区。更重要的事实是，日军引为挑衅借口的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并非因为什么“不法射击”失踪，而是因解手离队，20分钟后就已归队，但清水节郎有意不报告。当战后有人问及清水为何不报告时，他支支吾吾，只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但他又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显然，清水在战后的说法与当时的文献记载是前后矛盾的：当时，清水和一木决定对29军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理由是“士兵失踪”，但战后却说是“不法行为”，这显然是在说谎。7月8日凌晨2时，大队长一木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消息，却认为：“连联队长都下了交涉的命令，又因此而中止，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呢？”一木担心就此收兵，就会暴露真相，因此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不过此后日军挑衅的借口却由“士兵失踪”偷偷地换成了“不法射击”。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就曾推测它出自华北驻屯军的阴谋。甚至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有这种怀疑。在北平的日本人则更是极近真实地盛传：点火的人，是日军中级干部。那么，这些不约而同的判断是不是毫无根据呢？决不是的。新近公布的资料证实了这种判断，披露了具体的当事人——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

茂川秀和出生于1895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1931年被派往中国做特务工作。他擅长中文，在中国东北活动期间，受知于多田骏。后来多田骏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茂川则当上了天津特务机关长。秦郁彦在《日中战争史》一书中记载：茂川机关早在卢沟桥事件之前就从事搜集情报、民众“自治”运动和反国民党青年运动的幕后指导工作。7月8日晚间，关东军参谋田中隆

吉与茂川在天津芙蓉馆对饮时，茂川谈起“七·七”夜间放枪的事是‘学生’干的。早已心中有数的田中追问说：“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罗？”茂川点头承认了。在7月12~23日这段时间里，茂川又多次指使人趁夜色在两军之间打冷枪、燃放鞭炮，为日军扩大战火制造借口。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所谓‘不法射击’，完全是华北驻屯军和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以及日本国内侵华激进派法西斯分子共同策划的阴谋，他们是“七·七”变变的真正肇事者。

（林治波 撰）

谋炸宋哲元的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企图控制东北的日本军阀密谋炸死张作霖，以便乱中渔利。当张的专列过山海关行至皇姑屯车站附近、京奉南满铁路交汇处时，日军特务事先埋好的炸药爆炸，当场炸死吴俊升等人，张作霖受重伤，回到沈阳大元帅府不多时毙命。这就是国人熟悉的‘皇姑屯事件’。九年后，即1937年7月11日和19日，日本侵略军又故伎重演，在平津一线两度谋炸率部抵抗日军的爱国将领宋哲元，人称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驻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第29军将士奋起还击，揭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此时，第29军军长、主掌华北军政事务的宋哲元将军正在原籍山东乐陵休假。说是‘休假’，其实